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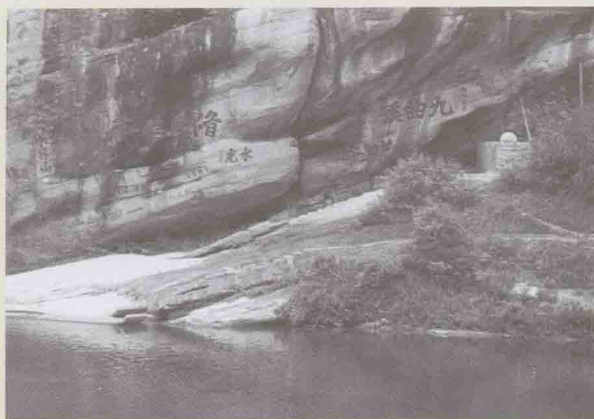
朱子学与退溪学研究： 中韩性理学之比较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编

张品端 主编





朱子学与退溪学研究：

中韩性理学之比较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编

张品端 主 编

陈国代 黎晓铃 副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学与退溪学研究:中韩性理学之比较/张品端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615-5788-4

I. ①朱… II. ①张…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李退溪(1501~1570)-哲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244.75-53
②B3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0575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2 插页:2

字数:525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8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和韩国为近邻,山水相依,由于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文化学术交流,13世纪末朱子学开始向韩国传播,于中世纪出现了朝鲜退溪学和栗谷学,形成了有别于中国的韩国朱子学。从中韩朱子学思想的发展来看,韩国对中国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韩国,而是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需要,是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所以,韩国朱子学作为中国朱子学的发展,有其相同之处;由于其不同的国度及与本土文化、社会环境相结合,又表现出相异性。

近三十年来,韩国退溪学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这个新学术领域的开拓,并发掘新的研究课题,无疑有利于推动中韩朱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韩国和日本的发展,同时也说明任何国家和民族想要发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而采取封闭式地内省方式。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形式之间的互参、互补,要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立互补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国学振兴院,于2010年在武夷山签订了共同开展“陶山九曲与武夷九曲文化比较研究”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每年一次,在中国武夷山或韩国安东轮流举办有关朱子学与退溪学的学术研讨会,就双方拟定的主题展开深入的讨论。2010年10月,在武夷山举办了主题为“朱子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在安东举办了主题为“韩中性理学交涉与九曲文化的展开”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在武夷山举办了主题为“朱子学、退溪学与书院文化”学

术研讨会；2013年10月，在安东举办了主题为“退溪学、朱子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在武夷山举办了主题为“朱子、退溪与工夫论”学术研讨会。显然，这些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拓展了中韩朱子学研究的领域。而研讨会的圆满成功，既有利于两国学者相互借鉴理论成果，又增进了双方的传统友谊。而且双方广泛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中韩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对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沟通、合作和友谊，也是大有裨益的。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只是把每次会议参与交流的论文汇集到本书中，而每届研讨会上，双方学者坦诚而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未能体现出来。特别是，由于翻译的难度较大，编辑的时间紧迫，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漏和不足。这很有些遗憾，但只能祈求得到读者的谅解。当然，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参与中韩朱子学的讨论，以推动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张品端

2015年9月

目 录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 | |
|-------------------------------|-----------|
|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 | 高令印 2 |
| “三纲五常”向“四德五伦”结构性转变的伦理需求 | 徐公喜 16 |
|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姚进生 24 |
|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张品端 34 |
| 朱子传播科学知识的途径 | 乐爱国 41 |
| 退溪学派的《武夷棹歌》和陶山九曲 | [韩]林鲁直 50 |
| 武夷九曲和朝鲜时代的九曲经营 | [韩]金德铉 64 |
| 陶山九曲与儒教文化 | [韩]李性源 77 |
| 朝鲜学者郑述对杨恒叔《武夷志》的增损 | [韩]郑万祚 88 |
| “武夷九曲图”传入韩国及其含义(提要) | [韩]尹轸暎 96 |

性理学交涉与九曲文化的展开

| | |
|----------------------------------|---------|
| 试论朱子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 黎 昕 100 |
|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 张品端 105 |
| 论朱子与退溪对心学的评价及其意义 | 解光宇 118 |
| 因物起兴 自有深趣 ——奇大升解读《武夷棹歌》 | 金银珍 128 |

| | |
|-------------------------|------------|
| 陶山图之传统与陶山九曲 | [韩]尹轸暎 134 |
| 韩国九曲文化研究现状与课题 | |
| ——以九曲经营与九曲诗为中心 | [韩]李钟虎 147 |
| 退溪的自然哲学与诗作中的自然观 | [韩]李东翰 159 |
| 建设实践儒学儒教文化圈的构想和建议 | [韩]朴璟焕 173 |

朱子学/退溪学与书院文化

| | |
|------------------------|------------|
| 书院对于宋明理学的重要意义 | 李存山 186 |
|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理论贡献 | 吴长庚 199 |
| 李滉对朱熹书院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 ——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例 | 张品端 209 |
| 清代福建正音书院研究 | 金银珍 218 |
| 书院精神于通识教育的启发 | 黄柏翰 236 |
| 陶山书院的理念及其展开 | [韩]金钟锡 247 |
| 作为朱子学的退溪学与独立的退溪学 | [韩]李相虎 262 |
| 朝鲜时期书院的发展与地区的特征 | |
| ——陶山书院与石室书院 | [韩]郑在熏 281 |
| 17世纪陶山书院与礼安乡校的比较 | [韩]朴贤淳 29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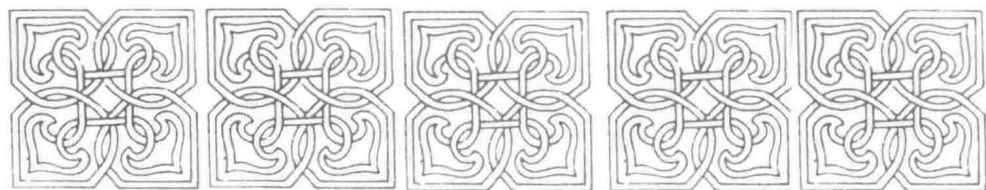
退溪学/朱子学与地域文化

| | |
|-------------------------|------------|
| 新安理学:朱子学的地域化 | 解光宇 308 |
| 朱熹与闽南文化 | 张品端 316 |
| 自我境界的提升 | |
| ——朱熹敬畏伦理思想研究 | 李永杰 328 |
|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 周元侠 335 |
| 乡约:退溪先生之理想世界 | [韩]郑震英 345 |
| 成就今日安东的思想背景 | |
| ——退溪的性理论 | [韩]黄晒起 358 |

| | |
|------------------------|------------|
| 退溪的主体礼学和安东的祭礼文化 | [韩]金美荣 369 |
| 门中:联结乡民与乡村的儒教共同体 | [韩]金明子 380 |

朱子/退溪与工夫论

| | |
|------------------------------|-------------|
| 朱子的修身工夫论体系 | 赖功欧 雷 扬 392 |
| “诚”是朱熹工夫论的最高境界 | |
| ——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 乐爱国 404 |
| 比较哲学视阈下的朱熹哲学工夫论 | |
| ——以朱熹论“敬”的工夫为例 | 赵妍妍 416 |
| 朱子涵养工夫略析 | |
| ——以主“动”为中心 | 崔海东 430 |
| 朱子理学工夫论研究的现代意义 | 黄柏翰 443 |
| 退溪李滉的工夫和自然环境 | [韩]林宗镇 458 |
| 从心学的观点来看退溪学的性理学 | [韩]安永哲 468 |
| 陶山书堂的造成和退溪的工夫论 | [韩]黄炳起 477 |
|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和“心”工夫 | [韩]秋制协 490 |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

◎ 高令印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朱子学是“东亚文化的体现”，这是日本现代著名哲学家岛田虔次说的，并得到美国著名哲学家杜维明、狄培瑞等国际文化学术界代表的认同。^①跟西方文化并称的东方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前后以孔子、朱熹为代表。并且，代表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大都经过朱熹比较准确地整理注释过，成为其后历代国家的标准教科书，因此研究孔子思想实际上就是研究朱熹的孔子思想。朱子学是东亚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是东方人的正宗文化意识。

一、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发展三大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方向南方转移。特别是灭了北宋的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杭州），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便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道教也紧随着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开始中国化，并逐渐有压倒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之势。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首先看出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失坠的是唐人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北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提出新儒学（理）。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

^① 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0页。

新儒学派别均在北方，北宋灭亡后由闽中游酢、杨时等“道南”，四传至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中国文化的重心，实现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北宋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①“地气”即国家的文化重心。南宋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②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

基于上述，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发展有三大阶段：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东周中期（春秋末年）的孔子总结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③，把中国文化由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 2000 多年，中华民族文化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道德的方向发展。孔子之后儒学的代表者是战国中期的孟子，他提出“居仁由义”、“亲亲、仁民、爱物”、“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④，完善了孔子的内圣成德之教。西汉的董仲舒把孔孟原始儒家与阴阳家结合，提出“天人感应”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此外，在东汉产生了道教和佛教传入中国。到隋唐，儒、佛、道由三教鼎立到佛教占优势到趋于融合，中国文化第一阶段终结。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至唐中叶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向后期过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南移，文化的核心——儒学也要相应的充实提高，改变为新儒学（理学）的形式。朱熹集濂、洛、关之大成，创立闽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综罗百代”^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后人把朱子学（闽学）与新儒学（理学）相提并论，是同等的概念。三是指 20 世纪“20 年代产生的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服庸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流派”^⑥。为别于宋明新儒学，被称为现代新儒学，其主要代表者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杜维明等。此第三期儒学当今正在发展中。由上可见，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①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三。

② 张栻：《南轩集》卷三。

③ 《中庸·问政》。

④ 《孟子·尽心上》。

⑤ 《宋元学案》。

⑥ 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 期。

二、天时地利人聪，朱熹在武夷山 把北来的儒佛道融合成新儒学

朱熹(1130—1200)的祖籍在今江西婺源，生老、求学、讲论、从政等活动主要在今福建。在闽北之武夷山一带有 50 多年，赴外省从政、逗留仅约 3 年。^①

著名学者蔡尚思谓，他“研究了自然美的山水已达 200 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即可登高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②。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③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再兴作出了伟大贡献。正如清人李光地所说的，“朱子讲学之堂，必水秀山明，跨越四方名胜；非是则不能聚一时之人豪，著千秋之大业也！”^④

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再兴确实是“千秋之大业”，不是某个学者单独所能完成的。武夷山“在赵宋之世，恒为巨儒所托足，龟山、屏山、晦庵、九峰，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⑤。清人董天工在论及朱熹及其武夷精舍时诗曰：“五曲层峦毓秀深，紫阳书院树云林；茫茫千古谁绍统，全寄先生一寸心！”^⑥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一则是讲论。跟朱熹讲论的师友，最早是刘子翬(屏山)，至今武夷山水帘洞遗存有清初地方官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的布告摩崖石刻。后来，朱熹自辟精舍，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⑦，知名者有吕祖谦、张栻、辛弃疾、袁枢等。吕祖谦和朱熹合编的《近思

①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年。

③ 《论语·雍也》。

④ 李光地：《武夷留云书屋记》。

⑤ 《武夷山志》。

⑥ 《武夷山志》。

⑦ 《朱子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 年，第 42836 页。

录》，是儒家经典的精当选本，在普及儒学上起了很大作用。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再则是撰写论著。反映朱熹成熟思想的论著大都是他在武夷山时期撰写的。例如，确立朱熹理先气后、格物致知、存理灭欲等观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均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与陆九渊兄弟和陈亮辩论尊德性道问学、王霸义利等的书函（淳熙十一至十六年，1184—1189）。朱熹在武夷山厘定《太极图说》、《西铭解义》，确立了关于太极、理一分殊的观点。有谓“文公于武夷精舍笺注《书》、《诗》、《易》以迄‘四书’、《家礼》”^①，还有《通鉴纲目》、数百篇书函、序跋、诗赋等，呈现出朱熹各个方面的思想。

综观朱熹在武夷山的讲论事迹和论著内容，他们是以儒学为主干，把北来的儒、佛、道融合在一起，像吃营养强身一样，使儒学壮大起来，重新树立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权威，使中国文化沿着孔子所开创的内圣外王的轨道往前发展。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到唐宋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粤、鄂，而后繁盛时期的“五宗七家”则转移到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制适合于中国佛教特点的“百丈清规”。当时，武夷山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地区。朱熹经常出没于武夷山及其附近的永乐禅寺、瑞泉庵、云际寺、景禅僧舍等。今武夷山慧苑寺还遗存有朱熹墨迹木刻“静我神”、“静神养气”等。^②其间，朱熹频繁地与僧人交往，如肯庵圆悟禅师居武夷山10多年，“尝受儒学于晦庵朱文公”^③。又如道谦禅师住武夷山附近的密庵寺，朱熹数次至之，现《朱文公文集》中有至密庵寺游记1篇和游诗6首。朱熹在给道谦的书函中有曰：

向蒙妙喜（大慧）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原受一语，惊所不逮。^④

道谦也有给朱熹回信，鼓动朱熹学禅。大慧名宗杲，号妙喜，是南宋主张

① 王复礼：《武夷山庄记》。

②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枯崖漫录》，收入《续藏经》。

④ 朱熹：《佛法金汤编》卷一五。

儒、释、道会通的著名禅学家。道谦是大慧的弟子。狗子有无佛性，是赵州从念禅与弟子问答的一件公案。后来禅家以“狗子有否佛性”作为“话头”（问题），以参禅收心。“将这话头，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凿，不要生知见，不要强承当。如合眼跳黄河，莫闻跳得过跳不过，尽十二分气力打一跳。若真个跳得，这一跳便百了千当也；若跳未过，但管跳，莫论得失，莫顾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拟议。若迟疑动念，便得交涉也。”^①此禅学对朱熹影响至深。朱熹说：

岂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觉未堕。释氏之见者。盖释氏是从空处求，吾儒是从实处见。^②

朱熹改造佛学的基本方法是把其说空换成讲实，“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二，吾儒一”^③。如他把佛学的“月印万川”改造成为“理一分殊”，使其成为新儒学理气关系的骨架。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哲学，是使其头脚倒立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④

武夷山是道教名山，这是清人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一开头就讲到的。在宋代，北方的原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冲祐观的道教神祇武夷君、皇太姥等逐渐结合起来。活动于武夷山的白玉蟾发扬北宋紫阳真人张百端的紫阳教派和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道派，成为道教南宗五祖，集道教南宗思想于一身，是宋明道教的代表者。因白玉蟾说法于武夷山冲祐观，观内遂有法堂之建筑。朱熹在武夷山喜欢与道士交往。如其诗有曰：

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未集，旷然心朗寥。……受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茆茨几时建？自此遗纷嚣！^⑤

朱熹对太极、理认识的抽象性一面，多取道家的观点。朱熹的《武夷图序》，就是应道士高文举之请而写的。

上面已经讲到，北宋末年闽中游酢、杨时把北方新儒学（理学）移植南方。今武夷山冲祐观对面大王峰山腰耀眼之巨大石刻“道南理窟”，即是记载理学

① 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下。

② 《朱子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第2157页。

③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5页。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⑤ 《朱子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第241页。

人闽事迹的。^① 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说：

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至豫章罗氏（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侗），李氏传之朱氏（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朱、张之学最得其宗。^②

杨龟山与游酢一同载道南归，然后其道在福建流传。谢良佐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同为程门四大弟子。胡安国是今武夷山市人，其学传给其子、侄胡宁、胡宏、胡宪等，是闽中理学的一大派别；其传承张栻至岳麓书院，形成湖湘学派。

由上可见，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儒、佛、道都汇集于武夷山一带。武夷山有三教峰，并有三教堂，冲祐观内原有群贤祠，等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塑像。当时武夷山是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儒、佛、道的荟萃之地。朱熹有笃实的文化素养，倚以天时地利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伟大任务。

三、朱子学的国际性演进和传播

到了南宋，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至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由朱熹把它们融合提高为闽学——新儒学。到了南宋末年，特别是元朝以后，很快北传至全国，并汪洋澎湃以至国外，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清人张伯行深刻指出：

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③

从武夷山一带为起点的朱子学的这种演进和传播，是具有十分深刻意义的国际性文化运动。

①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一。

③ 张伯行：《道南原委》卷首。

随着朱子学超出武夷山地区向全国演进和传播，其政治地位急剧日增。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诏定国家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等为准。清圣祖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辑《朱子大全》，颁行全国。南宋、元、明、清时代，朱熹等朱子学家著作和其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法定的国家教科书，文官考试不出朱子学界限。朱子学是国家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朱子学于宋元间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支配东方诸国思想文化700多年。上面讲到，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时期。对于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宋明新儒学）的国际性，美籍哲学家杜维明有段深刻的说明：

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儒学成为地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以后这个传统在越南也有相当的发展。越南在法国殖民主义征服以前受到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在许多地方，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行为，都受到儒家的影响。所以，（日本）岛田虔次指出：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这就是说，儒学不完全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这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有800年的历史。……朝鲜的李朝大概从1398年或1392年开始建朝，直到1910年日本侵略朝鲜灭亡，跨越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大王朝，这个朝代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学，其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家就是李退溪（即李滉）。从李退溪到他的学生李栗谷（即李珥），儒学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基础即是中国的朱学，也就是朱熹学统的发展。^①

朱子学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韩国退溪学、日本朱子学等，是朱子学的分支。李退溪的思想被称为退溪学，是当今国际文化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朱熹、李退溪等新儒家，把孔孟儒学更加具体化了，成为东方诸民族生存发展的指导和规范，生命的方向和理想，成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常道性格和应变功能，继往开来，畅通了东方文化前进上升的大道。

^① 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0页。

四、东方化的朱子学的基本内容和文化价值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就是东方人具有整体性和主体性的观念。这两个方面是朱子学的基本思想。朱子学不是专对中国人讲的特殊道理，而是向整个东方人类讲的，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一）由尊天上升到讲理

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把天作为本体问题进行认识，有天命等说法。孔子时而释天为自然界，含糊其辞。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断定天是有意志的。朱熹认为，天不外是苍苍之形体，而天意是理。这就摒弃了原先对天认识的宗教神秘色彩。他说：

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①

天即理，是朱熹理论的哲学本色。由此，朱熹把人们对天的认识上升到哲学本体论高度。他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②

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不各有理焉。^③

这就是说，理是最高范畴，是唯一的存在和永恒循环往复的运动，是整个宇宙万类以至社会三纲五常人伦道德的根源和共同体。

（二）理一分殊

在朱熹看来，理是抽象概念，它要通过万事万物才能呈现出来。这中间的环节是气。他说：

①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朱子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第3517页。

③ 《朱子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年，第448～449页。